

滾  
滾  
紅  
塵  
盡  
血  
淚

六十年見聞之七

●陳亞芳（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忠魂鵲血勝利之聲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創業與經營，春筓紀念農場的各項工作開始就序，播種工作早已全面展開。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有誰會料到一場更大的劫難卻又一次降臨到了我身上。

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仲夏的一天，十多名身佩槍械的青年男女在成茂師管區司令官王士俊將軍的公子帶領下，乘我到金陵大學上課不在農場的機曾毆打衛兵，強行闖入農場，我的母親以為是我金陵大學的同學來訪，正要熱情招待，那知這些人忽露兇相，強行將母親和小妹捆綁在屋裡，然後四處搶掠，搗砸箱籠，然後將房中所有值錢的首飾、化妝品、衣服以及蔣介石在西北所贈的精緻左輪槍一把盡數掠走。我回到農場後發現屋中狼藉一片，驚魂未定的母親向我訴說了經過。我得知詳情後立即驅車至成都

警備司令部嚴嘯虎將軍（嚴是陸軍大學將官班畢業，係張謂行同學）及成都最高軍政首長行轅主任張群（字岳軍）處報案，但各處聞知參與搶劫事件的青年都是成都各地地方實力派人物的子弟時（成都王學姜、向育仁、陳書農、黃逸民等人都擁兵自重，且其間多有姻親關係，他們的子女大都涉及這次搶劫）都不願意依法嚴辦，害怕惹怒了四川各實力派軍閥，從而引起四川局勢的動蕩，所以都極力勸告我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千萬不要再進一步追究，以免再招惹禍害，危及生命。

這件劫案發生後，四川各大報紙紛紛用大篇幅報導事情詳情，一時轟動川中。而我要嚴辦的態度又使形勢迅速複雜起來，一時春筓紀念農場說客如雲，市長陳靜珊、市議長向育仁等人都親自登門拜訪，勸我放棄嚴懲要求。但作為抗戰烈士遺屬，我無端受辱，難忍惡氣，在各界輿論的支持下，決定親赴重慶面見蔣介石，請求依法嚴辦。這

樣一來，雙方矛盾迅速的激化起來。川中各實力派人物為了防止事態發展不利於自己（劫犯搶去的贓物都寄存在川軍陳鼎勛軍長家中），竟公然置國法軍紀於不顧，派重兵封鎖了農場，限制我的活動自由，防止我出川告狀，同時槍殺了劫案的目擊者農場衛兵，並以恐嚇信和寄手榴彈的方式相威脅，揚言如若不接受調停將殺害我及全家。我雖身處困境，仍不改初衷，不斷託人投書重慶，請求中央政府出面為我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然而在劫案發生後，劫犯家屬中卻有這樣一位與其他各位家長表現截然不同者，他就是四川辛亥革命元老、抗戰名將，當時擔任成茂師管區司令，一二五師師長的王士俊將軍。

貴人襄助得以創館

王士俊將軍，字學姜，四川榮經人，（原屬西康省），生於民國前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少負才氣，以天下為己任，早年

考入四川陸軍學堂，畢業後升入陸軍部西安陸軍第二中學，同時加入同盟會，從事武裝反滿工作。一九一一年九月一日爲了響應武昌起義，陝西同盟會發動武裝起義（史稱西安光復），王士俊親率革命士兵衝入滿城，占領藩庫，首建奇功。陝西革命軍政府成立後，王士俊與四川旅陝同學組成四川革命軍，任分隊長，由陝入川策動反滿革命，終於促使四川新軍反正，四川光復。四川軍政府成立以後王士俊又奔赴四川北部擔任陸軍模範營區隊長，一九一二年復應北京政府徵召，入清河陸軍預備學堂（後改爲陸軍第一中學）學習兩年後，以優異成績考入保定軍校二期砲兵科。一九一七年軍校畢業後返回四川，在川軍中歷任連長、營長及團長、旅長之職。一九二七年北伐開始後，積極參戰，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三師六旅旅長。一九三五年入峨嵋軍官訓練團受訓。一九三七年後赴日、德各國考察教育制度。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時任二十二集團軍四十五軍一二五師師長的王士俊將軍，立即清纓北伐，率部由四川入陝西，復經風陵渡奔赴山西協同衛立煌、李默庵等將軍共同參加忻口會戰，時值嚴冬，冰天雪地中，川軍將士僅著單衣，憑藉簡單武器和滿腔熱血與日軍激戰月餘，沉重的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忻口會戰結束後，川軍經整頓後復編入第五戰區秩列隸屬於鄧錫侯集團。王士俊之一二五師與日軍多次激戰於魯南之

滕縣，微山湖及台兒莊一帶，共同取得了著名的台兒莊大捷。由於王士俊在台兒莊之兩下店、香城、界阿一帶身先士卒，英勇殺敵，阻敵立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爲其記大功一次，並獲海陸空甲等一級勳章多枚。徐州撤圍後，又率部參加著名的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屢建奇功。一九四〇年後調任陸軍四十五軍副軍長。同時兼任城茂師管區司令官，駐紮於成都。王士俊爲人淡泊高遠，忠厚敦良兼之文才超人，上馬殺敵，下馬著書，文武全才，因而川中各將領都盛贊王士俊是川軍「儒將」、「善人」，我創辦春筍紀念農場的土地，就是從王士俊將軍手中購得的。

王士俊將軍早年就讀於保定軍官學校，加上任一二五師師長時曾受一戰區張謇行將軍指揮，故而對張謇行的才子膽識及耿介品質頗爲敬重。張將軍殉國的消息傳出後，王將軍曾爲國失干城而痛心不已。所以當我爲創辦紀念農場籌集資金而進行義賣時，這位人稱儒將的川軍將領曾專門抽空前來拜訪，頗具君子之風的他特意購買了張將軍生前用過的一些軍用品如德國照像機、制服及軍靴等，以紀念自己尊敬的老長官。一九四四年當我託人覓地準備購買以開辦春筍紀念農場時，得知這一消息的王將軍深深的爲其生死以共的眷眷摯情和不忘故人的高尚作風所感動，於是便以半價之數將郊外全部田產賣與我，以表示對自己老長官的尊敬和懷念。誰

知自己的子女竟會如此不肖，不務正業，以至於持槍打劫自己老長官夫人的住所，毀壞爲紀念自己爲國殉職的長官而設立的農場。王士俊將軍聞訊後，當即趕至現場，見到劫後一片狼藉的農場，當場氣得不省人事，昏迷倒地，被人送往成都陸軍醫院，經搶救後，甦醒脫險。第二天，身體剛剛復原的王將軍立即赴成都行轅，大義滅親，嚴正聲明請求政府依法嚴辦，並以戰時戒嚴條例予以重罰。同時，爲了表示自己懲治罪犯的決心，更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聲明，斷然與不肖子女脫離父子關係。這種大義滅親的正義之舉在當時四川舊軍人群中實在是不多見而令人欽佩的！

### 追回失物既往不咎

成都劫案發生後，四川軍閥及地方實力派人物與國民中央政府關係一時緊張，對抗情緒日益增長。早在一九三七年，蔣介石在重慶上清寺范庄召開川康整軍會議，企圖壓制川中各派，從此以後，川中與國民政府之間開始產生矛盾。一九三八年一月，蔣介石又撤銷川康綏靖公署，任命張群爲四川省主席，準備乘抗戰之機「乘火打劫」意圖宰割川中大老，各派人物在成都四處張貼標語，並舉行遊行示威，反對蔣介石政府，雙方矛盾公開激化，張群入川後爲了保證大西南後方穩定，對川中各派採取了寬容放縱態度。爲了解決成都劫案，蔣介石專門派戴季陶

劫罪行。

### 意外婚盟進退兩難

（浙江吳興人，名傳賢，號天仇，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係國民黨元老，辛亥老人，當時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以中央特使身分赴成都調解。戴季陶至成都後對雙方反復勸說利害，曉之大義，他告訴我，國府入川以重慶為陪都後，成都則為大後方之大後方，作為抗日戰爭的後方基地，成都的穩定關係著國家民族的抗戰大業。但實際上川中地方軍政府的潛在實力依舊很強，加上由於長期對中央國民政府認識不夠，多懷有一定的戒備心理，大敵當前，一致抗日，務必以團結地方實力派為重。中央政府各項政令法規的實施還要依靠這些地方實力派的通力合作方才能貫徹生效。搶案罪犯多係四川軍隊各軍事首長的子弟，如果依法嚴辦，則會使各家家長感到難堪，甚至懷疑中央國民政府專門與其為難，勢必會引起川中實力派人對國民政府的不滿與敵視，如若這樣，川中局勢動盪，肯定會影響到抗戰大業。所以戴季陶反復向我表示，一定替我追回所丟失的財物，並讓所有參與劫案的各家子女及家長登門致歉，以示負荊請罪之意，但求我不要讓其對簿公堂，在大眾及輿論面前保全川中各派人物的面子，給其一個下台的機會。為了顧全大局，我答應了戴季陶的要求，表示可以不依法嚴懲。不久，案犯及其家屬數十人當著當地首長向育仁、警察局長徐中齊的面將所有搶去的物品歸還給了我，並寫悔過書，表示永不再犯，懇求我寬恕他們的搶

農場劫案事件了結以後不久，戴季陶以個人身分再次來到春筓紀念農場，代表大義滅親的王士俊將軍（妻劉氏已亡故）向我求婚。王士俊表示由於自己養子失教，自思無以贖此罪行，願以有生之年，充當長官夫人的侍衛，保護老長官夫人安全，並願意將自己所有的田產，轉於長官夫人名下，藉以賠償夫人物質及精神上的損失。戴季陶語重心長的勸我道：「夫人之美，美在端莊而溫文如花似玉，且有巾幗英豪之氣，妳是國家至上的巾幗英豪，人所共欽，希望妳能以國家為重，放大胸襟，能否犧牲個人名節，接受王將軍的請求，這樣既能完成創辦春筓紀念農場的事業，又可以力勸王士俊將軍再次出川抗倭殺敵為國家民族效力，望夫人鑒之！」

川中劫案發生後，處於軟禁之中的我，幾乎是萬念俱焚了。自張謇行殉難之日起，我全部的感情以及生命意義都化為灰燼隨其而去了。而此後的六年中，我萬里飄零，四處奔波，無非是想為國家民族的抗日大業多盡一份力量，從而完成張謇行未竟的抗戰事業，向萬惡的日本侵略者討還血債，直至抗戰達到最後勝利而已，然而卻屢屢身遭不幸，先有投身前線，救護傷兵，無端遭劫受辱於洛陽，後有歸隱田園，創辦農場，遭劫成

都，天理何在？人道又何在？難道真是自己生來命薄，既遭天棄，又逢人遺嗎？我幾次想到了此殘生，但念及遠在千里滬濱的嬌子以及身邊自己的白髮高堂和年幼的小妹，又怎樣置之不顧而去呢？只好忍辱負重，偷生苟活，現在德高望重的戴季陶再三好言勸慰，又以國家民族大義相勸，萬般矛盾中的我幾乎進退維谷，在名節觀念與民族大義國家至上之下，我似乎很容易，卻實際上很難加以選擇，從感情上來說，我所有的愛都已埋葬在西安翠華山下的那一杯小小的黃土中與自己心愛的春筓長眠地下了，從理智上講，我一直以國家民族為上，一直願為民族的抗日事業貢獻青春，甚至生命。但是現在讓我嫁給一個自己並不喜歡並且十分陌生的人（雖然對其有著幾份敬重和欽佩，但這並不是愛），這對於我這樣一個心如死灰的女子無疑是殘忍的。儘管它的前提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大義，為了抗日戰爭的大業。單身的寂寞是痛苦的，但是寂寞中的喧嘩更為痛苦，這個突如其來的求婚，再次把我框進了大我與小我的焦點之中。在一個多月的反覆考慮之後（其間戴季陶曾先後八次拜訪，促我作出決定），我決定為報國仇而作「昭君」，同意了王士俊將軍的求婚要求。但這一決定又是在多麼複雜而又矛盾的情況下，經過痛苦的思想與權衡之後才作出來的決定啊！當時的我曾寫下了這樣的兩首詩來描述自己複雜而又痛苦的心境和感受：

〈其一〉  
殘菊傲霜迫孤魂，昔日雄心何處存？  
未報慈恩心已碎，那堪和番作昭君。

〈其二〉  
做霜殘菊依忠魂，一縷相思萬種情，  
心碎不忘家國恨，夢痕何處覓春筍！

### 出川奔馳奔波救護

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抉擇，我決定犧牲小我，以成全國家大義，接受王士俊將軍的請求。經過雙方協商後達成協議於一九四四年陽曆八月廿六日在成都訂婚，並於同年九月九日之重陽節正式結婚於成都東郊外春筍紀念農場的留芳園內。

在訂婚之前，我曾向王士俊將軍提出過四個要求：

- 第一、王士俊必須親率所部一二五師人馬出川抗戰，殺敵保國，為國盡忠。
- 第二、王士俊必須與所有參加劫案的不肖子女永遠斷絕父子關係。
- 第三、王家所有財產必須全部歸於我名下，將全部用之作爲創辦社會福利及春筍紀念農場的資金。
- 第四、王士俊將軍改姓陳，結婚之日，必須乘坐花轎大街小巷來到陳家，兩人結婚後必須分室而居，婚姻僅具形式，並不履行夫妻生活關係。

我之所以要這樣做，只是爲了出胸中一口悶氣，同時也好讓身居高位的王士俊將軍

知難而退罷了。那知忠厚敦良，極其君子之風的王士俊將軍竟然全部接受了我這四項條件。在結婚以後的幾年中，王士俊將軍一直與我分室而居，始終以長官夫人之禮對待我，並希望用此來彌補自己良心上的萬般不安。王士俊將軍的所爲實在大出我意外，也令我感動與敬重，我那一顆不安的心終於踏實了。

### 整頓田莊拜祭祖祠

婚後的第三日，我正式接管了王家所有的田產：計成都西御西街二十三號、韜廬、峨帽山下的餐秀山房（共計十六間）、成都崇寧的田莊、武陵村及郫縣的田莊、薔薇院以及新津、鼓山等地的田莊。我接受田產後，立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對各地田莊重新管理整頓。首先對所有農莊管理人員進行嚴格訓練，實行軍事化管理，每月按工作成績發給工資，成績優秀者另有獎勵，這樣就提高了大家的積極性，由一二五師舊部賀正席加強管理，擔任總管一職，負責全局工作。同時，我對王家所有參與劫案的子女每人贈水田二〇〇畝，供其改過自新後維持生計，這些不孝浪子們喜出望外，無不對我感激不已。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我在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王士俊保定同學）的邀請下，冒著初春大雪，回到西康榮經善人庄探望年已八旬的婆母王太夫人（王將軍生母），整頓家務，拜祭王家祖墳祠堂。當時的榮經

鄉民爲了迎接台兒庄大捷的抗戰英雄，自發組成了舞獅隊和龍燈隊在王家門前的空地上通宵達旦的表演，竟然長達十數日。爲了報答家鄉父老鄉親的厚愛早年曾在日德各國考察教育制度的王將軍在我的建議和幫助下，出資購地十餘畝爲家鄉創辦了一所設備齊全、頗具規模的小學和一所全日制中學，設立了一座設備齊全，藏書多達萬餘冊的圖書館，希望能用自己微薄之力促進家鄉教育事業的發展，希望這些學校和圖書館能多爲家鄉培養人才。不久，王士俊將軍在我的勸導和鼓勵下，毅然再次率所部出川抗戰，並與日軍激戰於湖北老河口一帶，這就是著名的老河口戰役。

### 救傷濟弱積勞成疾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日軍爲了確保平漢路南段交通，破壞中國守軍在陝南以及豫西空軍基地，在豫鄂地區集結了兩個師團（共七萬餘眾）的兵力挾飛機大砲猛烈攻擊中國守軍四十五軍之一二五師陣地，企圖驟集其在華中各地之殘餘勢力作困獸獨鬥。中國守軍在四十五軍副軍長王士俊和一二五師師長汪匪鋒的帶領下，奮起還擊，花城門一帶陣地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數次易手，當時該師步兵營五百餘眾在營長范仲少校的帶領下佈防於北城門一帶，成爲日軍強攻的重要目標，該營四位連長全部陣亡，范仲營長也身負重傷，官兵傷亡慘重，僅餘三成，戰至

最激烈時，我方陣地為煙火籠罩彈片橫飛，副軍長王士俊親臨火線督戰，我軍士兵士氣大振，竟以一師兵力抵抗數倍之凶殘日軍長達半日之久，使敵人棄屍城下，傷亡慘重。

四月七日，在五戰區長官劉峙將軍命令下，傷亡過半的一二五師退出戰場，移駐於均縣、隨縣一帶，防線由二十七師師長接管。老河口戰役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最後囂張氣燄，為我軍第五戰區的全面反攻贏得了時間，據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中統計：老河口戰役經七十二日（三月二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斃敵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人。老河口戰役結束後，四十五軍軍部駐紮於湖北隨縣一帶，我隨軍至此，送別母親胡氏經老河口、洛陽返回上海。

老河口戰役之中，我方將士傷亡極重，而白河附近的陸軍醫院反能容納三百人，但傷亡人員已多達一千二、三百人，收容超量達三倍以上，加上醫院設備簡陋，醫藥缺乏，很多傷員被安置於民間或放於破廟之中，數日之內難得換藥一次，傷兵死亡極多。在這種情況下，我每日自己攜帶藥品跋涉至前線，救助傷員，為他們換藥護理，致贈藥物。當時任陸軍四十五軍一二五師三三七團三營營長的范仲先生（去台後曾任馬祖指揮部少將指揮官）就是在我長達十餘日的精心救護下死裡逃生的。幾十年後，他會寫過一篇《救我回生的陳姓女士》在文中他這樣寫道，當他得知這位無怨救護傷病員的陳姓女士

。二十多年前在他瀕於死亡時護其回生的救護者竟是自己老長官的夫人時竟「使我驚異，並感動得流淚！」

### 溫馨農場傷兵家園

老河口戰役結束後，我因操勞過度而患傷寒養病於湖北隨縣環潭鎮的一個天主教堂醫院內，在這一段日子裡，我目睹許多從前線撤下來的傷殘官兵，由於當地政府部門安置不力，竟然無家可歸，終日東乞西搶，往往淪為乞丐，或鋌而走險，上山為盜為賊，心中大為不忍。經過考慮之後，我將身上所有首飾變賣，購買了三百畝山田，收容傷殘官兵，並親自制定了嚴格的農場管理制度，在一位受傷營長莊清山的幫助下，成立了亞西傷殘救濟農場，凡是在農場登記的傷殘官兵，必須嚴格遵守農場規章，禁煙、禁賭、禁嫖、不准打架鬧事，農場按月根據其勞動情況發給新餉，年終有獎金、傷殘士兵可與當地婦女結婚成家，一時傷兵聞者雲集，不到半月時間，已經有幾十名傷殘士兵登記後進入農場勞動。我利用自己創辦春筍紀念農場的經驗，大力飼養牛、羊、雞、豬等禽畜，作為農場副業加上環潭依山傍水，又因地制宜，利用山坡開墾梯田，按季節天時種植水稻，並在其間間種蔬菜以及雜糧，坡地放牛放羊，池塘養魚養蝦，兼飼鵝鴨，並種蓮藕。在我苦心經營下，經數月努力在莊清山的主持下到秋季時，新米登場茅舍造成，吃

住問題解決，整個農場呈現一片井然有序的繁榮景象。經過我的不懈努力，至一九四八年，一個有百餘名農場工人，數百畝農甲的軍事化管理、企業化經營的龐大農場在湖北隨縣的環潭鎮迅速地成長壯大起來。在當時戰火瀰漫、人心不安的動蕩局勢下，創辦這一個傷殘救濟農場是多大的一個難得而又富有價值的創舉啊！正是在這一塊塊農場土地上，成百上千的傷兵獲得了一個人人的待遇和希望，又有很多人在這裡獲得了一個人的快樂和贊賞！對於我來說，傷殘士兵們的快樂和贊賞就是對我辛勤付出的最好回報了！

### 抗戰勝利血淚成河

一九四五年，日寇已走向了窮途末路，敗跡畢露，六月二十二日，美軍攻占沖繩島，並多次轟炸日本本土，二十六日，美、英、日三國政府發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告誡日本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對此斷然拒絕。八月六日、九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下令在日本陸軍基地廣島、長崎兩地各投擲一枚原子彈，日本傷亡慘重。同日，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對日本七十五萬關東軍以殲滅性打擊，與此同時，中國戰區部隊也開始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反擊，向日本侵略強盜發出最後攻擊。日本侵略強盜走投無路，於八月十四日宣布無條件投降，長達八年之久的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最後取得了徹底勝利。九月初，當日本侵略者在東京灣

的美艦「米蘇里克」號上簽訂無條件投降書的消息傳出以後，全國人民欣喜若狂，熱烈慶祝，將軍、士兵、商人、市民、官員一同走上街頭，流著眼淚共同慶祝我們民族抗戰事業的偉大勝利。從「九一八」事變到抗戰勝利，在整歷十四年的艱苦奮鬥中，中國軍民與日本侵略者作戰十二·五萬次，斃敵五十二萬人，為此中國軍民傷亡多達二一〇〇萬，財產損失六〇〇多億元，我們的民族為爭取這一勝利付出了多少眼淚、鮮血和生命！當大街上響徹雲霄的炮竹聲傳來時，抱病在床的我不禁激動得熱淚盈眶，是啊，在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中，我付出了父親和丈夫的生命，付出了自己整整八年的青春，在這八年中，我又流了多少汗、多少淚，付出了多少艱辛呢？在這抗戰勝利的偉大時刻，我想到了自己還在上海的幼子，白髮的高堂慈母，碎破荒蕪的家園，古都長安的愛人墓園，自己為國而逝的親人們，所有為國家而捐軀的烈士們是否也能聽到這祝捷的炮聲和歡呼呢？

這時，國民黨四十五軍已改編為四十九軍，王士俊任軍長，率部至許昌、漯河一帶接受當地日軍投降繳械。我把湖北隨縣的亞西傷殘農場托付給總管莊清山管理（以後由於戰亂，我與莊清山失去聯繫，農場發展情況就不得而知），然後以抱病之軀前往西安，修葺張譜行墓園，把勝利的消息告訴給自己的愛人。不久，我又返回成都安排春筓紀

念農場的一些事宜……。

### 生生不息卓然有成

從農場創辦到抗日戰爭勝利的這一年多時間中，我苦心經營，紀念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生產不斷發展。每逢春夏雨後的日子農場內百花怒放，農舍掩於綠柳，蜂蝶舞於花叢，惹得每月有許多人專程從城內至農場參觀遊玩形成了門庭若市的局面。加上我又畢業於金陵大學農學院，對犁地深翻，選擇插秧、除草施肥、收割脫粒、烘乾入包無不內行，並且事事身體力行，所以農場的收入不斷提高，土地面積也漸漸的擴大，並開始購進了一些簡單機械，準備進一步擴大再生產。我和王士俊將軍結婚了，在急公好義的王士俊將軍的幫助下，我多方籌集資金，作了許多從事救濟貧困的社會福利工作，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春筓紀念農場」創辦附屬農工科學校，後來擴建為春筓農工學院，並聘請四川理工學院李壽同博士為院長，每期招收一定數量（約二〇名左右）的工讀學生，一邊在農場從事翻土、晒田、播種等實踐性工作，一邊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從實際上升到理論，並進一步作一些如芽接、改良品種等技術性探討，所有在校學生的衣、食、住、行都由農場負責，並按月發給少量津貼以備零用，學業結束後由學校負責免費送入高一級農業學院進修深造，這一做法使許多青

年在半工半讀中完成了自己的學業，成為了國家的有用之才，直到現在，四川農學界中還有不少人是從春筓農工學院畢業的呢！我的這一舉措即為農場和社會培養了一大批農業技術骨幹，又在一定程度上資助了清寒子弟，並促使他們成為有用之才，可謂是一舉兩得的善舉！

其次，創辦平民醫院。在成都郊區生活的幾年中，我目睹郊外農村缺乏醫藥及醫生，貧困之家有病者往往無錢醫治，只能坐以待斃，甚為悲慘。創辦春筓紀念農場不久，我就利用農場的一部分房產和資金（約三十畝地的租稅收入）創辦了一所芳江平民醫院，聘請醫學博士張超昧擔任院長兼外科主任，陳大漢醫生擔任內科主任，並另外聘請婦產科醫生及護士八位，共設病床六張，凡農場附近的農民都可免費就醫，產婦生產可入院治療恢復一周，所有醫藥、飲食費用均由平民醫院負責承擔。

第三、鑒於農場附近的農村孤兒及兒童無人教育，流浪兒無家可歸，我又集資創辦了一所幼兒園，免費收養無家可歸的兒童，使他們自幼在良好的環境中生長，接受教育，長大後成為國家的有用人才。

第四、在成都西城街及西康雅安巷坪山麓的康莊投資創辦了一個收容、護理無家可歸老人的頤養院，使這些貧困老人在較好的生活環境中度过其晚年。

第五、以紀念農場為依托，在陝西街一

○六號集資爲因戰爭流亡至四川的山東難民創辦了一所華西綉花廠和機器織襪廠，爲他們提供了一個養家活口的機會和場所。

我這些服務社會的義舉爲春筓紀念農場贏得了良好的聲譽，獲得了社會各界的普遍稱讚，同時也真正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因此一九四九年，當蔣經國到春筓紀念農場參觀時，非常欣賞農場的管理及經營，盛讚我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個「真正巾幗英雄」並力勸我競選國大代表，但是早已厭倦名利的我卻回絕了他的好意，一笑置之。

抗戰勝利時，我從西安掃墓返回成都後，立即把王士俊將軍的母親王太夫人從偏遠的西康榮經接到繁華的成都，使高齡婆母充分享受與子同居的天倫之樂。不久，我在農場工作較閒的季節裡，抽出了一段較長時間由王士俊將軍陪同返回上海探望自己的母親胡氏及分別多年的愛子慎兒，接著兩人又乘興至孤懸海外爲日本占據五十多年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寶島——台灣參觀遊玩，取道廈門乘海船至素有「東方之珠」美稱的香港，遊廣州附近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孫中山先生的故居——中山縣翠亨村，接著又沿粵漢鐵路入湘，歷遊衡陽、長沙各地，北至武漢返回成都。乘抗戰勝利之機，遊覽淪陷於日本侵略者鐵蹄下長達八年之久的大好河山，看青山綠水再展歡顏，是我多年的夙願，面對萬里故土，大好河山，錦繡風光，我再一次

感到了我們祖國五千年文明的強大生命力，再一次強烈的感受到作爲一個炎黃子孫的自豪和驕傲。

### 拋棄所有輾轉赴台

一九四六年五月（民國三十五年），國民黨政編統一編遣全國軍隊，陸軍四十七軍改編爲四十七師，王士俊將軍改任中將師長。

六月份內戰爆發，本應攜手合作，共建繁榮、富強、文明的新中國，醫治八年抗戰創傷的國共兩黨又同室操戈，多災多難的中國再一次陷入戰火之中。戰爭爆發之初，王士俊所部四十七師曾與人民解放軍劉伯承部、李先念部先後作戰於河南羅山、光山、開封一帶。同年六月，王士俊在長垣前線視察時，墜馬負傷，傷及腰部，送入陸軍總醫院治療，不久在我的建議下，向國防部請長假，竟欲退出內戰漩渦，未獲批准，不久改任重慶綏靖公署中將參議，王士俊又堅辭不就，復電國防部請求退役，又未獲批准。於是王士俊以養病爲名，與我退居成都春筓紀念農場，靜觀事態發展，過起了深入簡出的隱居生活。

一九四九年秋，川中形勢惡化，自蔣介石辭去總統，隱居奉化後，國民黨軍一敗再敗，胡宗南在扶眉戰役後放棄西安由漢中撤入四川，率領殘部數十萬眾退縮於成都平原，劉、鄧大軍及彭德懷的西北野戰軍從南北

兩線入川夾擊成都，形勢對國民黨軍極爲不利，加上由於負責成都防務的長官羅廣文管理不力，奸商哄抬物價，散兵四處敲詐財物，整個成都到處處於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慌亂與忙亂之中，當時蔣介石及蔣經國會數次秘密入川，與川中各方面軍政首腦人物如劉文輝、鄧錫侯、關麟徵（陸軍副總司令）、徐中齊（成都警察局長）、徐煥昇（空軍司令）等人，聚於春筓紀念農場，討論形勢，商議對策，消息洩露，一時引得四川大學數百進步學生衝擊農場。爲了保證安全，我首先將農場儲備的各式槍械（包括手槍、衝鋒槍、輕重機槍二〇〇〇多件及充足彈藥）移交胡宗南部管理，同時開始遣返家中奴僕，每人發三年餉薪，各人自謀出路，爲了以防不測，我將在成都的一些田產以低價出售，得大洋四千餘元，以作出行之預備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晚，我和王士俊謝絕了保定同學、舊日好友劉文輝、鄧錫侯等人要其出山，任西康省主席，指揮川中軍隊的挽留，擺脫了羅廣文等人的秘密監視，拋棄了其在成都的所有田地及房產，辭別白髮蒼蒼的高堂老母，於次日凌晨，以照相爲名，驅車至成都附近的新津機場，乘最後一班飛機經海南島三亞（我在此曾住院治療）於六日抵達台灣之新竹樹林頭機場，從而開始了兩人飄泊孤島，相依相靠，痛苦而又坎坷的海外生涯。（未完待續）



① 作者陳亞芳(左)一九四四年與夫婿王士俊(右)合影。  
② 陳亞芳(左)與王士俊將軍(右)結婚時留影。





① 陳亞芳（左二）與母親（右）妹妹（左）一九四二年在成都合影，右二為馬書城女士。  
② 陳亞芳（右）早年在西安與張誦行的五弟張潔之夫婦（後左、右二）合影。

